

# 陽明學和晚明文學

①

李  
慶

〔關於陽明學。此从略〕

从十六世紀初到十七世紀中叶，中國文坛上，涌现出兩股極為顯著的潮流：一是陽明學的興起，一是文學的繁榮。現在的問題是，這兩股潮流之間，有着怎樣的关系呢？中外的研究者，對此發表過許多不同的看法，歸納起來，大致有三大類：

第一，以為王守仁的學說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反動思想，而晚明文學則在相當程度上表現出對封建主義的批判，因而是對程朱理學和陽明學的反撥，具有相當的進步意義。

第二，以為陽明學是反動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但陽明學有左派和右派之分，王學左派突破了陽明學的藩籬，是進步的，是晚明文學的思想基礎。

第三，以為陽明學是主觀唯心主義與否姑且不論，它也包含着一定的進步因素，因而表現出與具有民主性，進步性的晚明文學的一致。

質言之，在晚明文學这块園地中，圍繞着陽明學和當時文學潮流的关系，還有許多地方有待人們去開拓。本文只从一些基本的材料出发，对阳明学和晚明文学之间的关系，作一点探讨。

陽明學和明末文學的關係，不僅表現在思想上的呼應，而且還表現為具體的人事的聯繫。有的陽明學者，本身就是明末文坛上的饒將；有的著名文學家，又是篤誠的陽明弟子。他們或是同僚朋友，或是師弟再傳，互相交叉，結成了一個龐大的社會網絡，支撑起了這個時代的文化。下面，我們就來探討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先看王陽明和太子相同時代的前七子的关系。錢謙益的《列朝詩集小傳》載：

（王陽明）在郎署，與李空同諸人游，刻意為詞章。居夷以後，講道有得，遂不措意工拙……<sup>②</sup>

而黃紹所撰的《陽明先生行狀》云：

己未（弘治十二年，1499）登進士，覈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夢阳，何景明，姑蘇顧璘，徐楨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馳騁，學古詩文。<sup>③</sup>

考李空同弘治六年（1493）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居京師，至正德元年（1506）因代韓文草疏劾宦官劉瑾，被貶，尋又下獄。他在京師，十余年間，叱咤文坛，凡三下獄，頗有聲名，與王守仁相比，先聞于世。何景明弘治十五年（1502）舉進士，徐禎卿弘治十八年（1505）舉進士。④而王守仁於「弘治壬戌（1502）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到「弘治甲子年（1504）起復主試山東」<sup>⑤</sup>，有數年不在京中。到正德元年（1506），他也因忤劉瑾而被貶貴州龍場。从以上他們生平的大致情況來看，王陽明和李夢陽等七子的交往，主要是在他形成獨立的思想體系以前。思想的發展，當然不可能是毫無基礎的突現，從以上這些人都反對宦官劉瑾，並且相互交往的情況來看，他們的思想在當時有着若干的共同點，恐怕是合理的推斷。

那麼，在王陽明「龍場大悟」，提出了自己獨特見解以後，又如何呢？王陽明在他為前七子之一的徐禎卿撰寫的《墓志銘》中<sup>⑥</sup>，載有如下情況：

正德庚午（1510）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仙釋。昌國（按：徐禎卿字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撰形化氣之尤……

但王陽明這時主「存心盡性」之說，徐禎卿听了以後，甚為感觸，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几亡人矣。

這裡說的「正德庚午冬」，當正是王陽明從龍場返回之際<sup>⑦</sup>。在墓志中，可以看到一些關於「心即理」，「心性合一」的內容，表述得雖還不很成熟，但這樣的思想，則是顯然可見的。徐禎卿對此欣然接受，也證明了他們之間思想上的一致性。

王陽明返回京城時，康海，王九思已因與劉瑾的牽連而被罷

官<sup>⑧</sup>，李夢陽還在河南鄉間<sup>⑨</sup>，似未得相見。考李夢陽《空同集》，其卷十六有《甲申中秋寄陽明子》五言古詩一首，云：

風林秋色靜，獨坐上清月。

春茲千里共，眇焉往吳越。

窮穿陽明洞，律兀芙蓉闕。

可望不可即，江濤滾山雪。

詩題中的「甲申」，當為一五一四年，即嘉靖三年。是時，王陽明平定了宸濠之亂，其學在全國流布。李夢陽的詩中，除了對王陽明表達了老友的思念之情外，也多少還有一點欽慕之意吧！

從以上的事實可以看出，「前七子」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王陽明有着較好的個人關係和交往。他們同是明朝弘治，正德年間政界，文坛上活躍的人物。聯系到這個時期正是明代文學前後期的分界線，<sup>⑩</sup>再來看他們的崛起，他們思想上存在的一致性，也就可以說，那都不是純粹的偶然了吧！換句話說，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在思想上，是互相呼應，互相影響的。

再來看稍后的唐宋派作家與陽明學的關係。

唐宋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唐順之，在他的《與季彭山書》中，曾經這樣談到自己思想的變化：

僕不自慧，自少亦嘗有志於治經，漢宋諸儒以解經名家者，亦頗涉其津焉。……久之，竟未之得也。偶游會稽，獲聞高論，則爽然自失。<sup>⑪</sup>

那麼，他從什麼人那里，獲知了怎樣的高論呢？《僉都御史荆川唐公順之言行錄》中，有如下的答案：

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弟寓京師，先生一見之，尽叩陽明

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⑫

也就是說，他從王龍溪那裡，學到了王陽明的學說，並奉為聖賢之道。這一點，我們在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中，也可以得到印証：

先生之學，得之龍溪者為多，故言於龍溪，只少一拜。

（按：此處「先生」，指唐順之。）⑬

順便提一下，唐順之的交遊之中，季本、聂豹、羅洪先等，也都是陽明學派里知名的人士。而季本和王龍溪又是我們在下文要提到的徐文長的老師。由此觀之，唐順之和陽明學的關係，當可明確了。

唐宋派中另一著名人士茅坤，也和陽明學有相當的關係。《明史·文苑傳》稱他「最心折唐順之」，而《歷朝詩集小傳》中，載有這樣一件事：

順甫（按：茅坤字順甫）於同時，惟推荊川一人。胡續溪（胡宗宗）嘗以徐文長文示之，詭云荆川，順甫讚嘆不已，曰：「非荊川不能作。」已而知為文長也，復取視曰：「故是名手，惜后半稍弱。不振耳。」

此則故事中，茅坤的形象如何，姑且不論，如从人事而言，它反映了茅坤對唐順之的推崇，反映了胡宗宗、唐順之與茅坤之間的關係頗為密切，則是顯而易見。

王宗沐使道丹徒，適茅坤為令，相留竟日乃別去。⑭

此外，茅坤和身為「后七子」之一的另一位當時著名的陽明學者王宗沐也交往深厚，據有的材料記載：

和「后七子」的關係。

「后七子」活躍之際，陽明學已經在全國展開。這些作家，可以說就是在弥漫着陽明學思潮的社会环境中成長起來的。

「后七子」的代表人物王世貞，他在十四歲的時候，得到王陽明的文集，讀之，愛不釋手，他自稱「愛之出于三蘇之上。」⑮

此后，王世貞經歷了父親王忬被處死的家庭變故，真到隆慶元年才得以平反。《明史·王世貞傳》載：

隆慶元年八月，（王世貞）兄弟伏闈訟父冤，言為嵩（嚴嵩）所害，大學士徐階左右之，復忬官。

因而王世貞對徐階一直十分感激，《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所載致徐階的信札，多以師事之。那麼，徐階又是怎樣一個人呢？《明史》卷二百十三本傳云：

嘉靖二年進士第三人。……讀書為古文辭，從王守仁門人

遊，有声士大夫間。  
他曾主持朝政多年，關於他和高拱等的內閣爭紛，明代史籍多有記載也可參見朱東潤先生所著《張居正大傳》，此不贅述。徐階沒，正是張居正執掌權柄時，對社會上的講學之風，略有鉗制。而王世貞在為徐階撰的《大學士徐公傳》中則稱：

階性穎敏，讀書為古文辭，傾身以事豪賢長者。時新建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與其門人歐陽德同年而善之，遂為王氏學。⑯

徐階是陽明學的積極倡導者，流布的《王文成公文集》的序，就是他寫的⑰。由此看來，王世貞和陽明學者間的關係密切，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后七子」中另一位人物王宗沐本身，就是當時陽明學派中的一位

有數人物。黃宗羲《明儒學案·浙中王門學案五》載：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台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在比部時，與王元美為詩社，七子中一也。

而他「師事歐陽南野」（指歐陽德）。

此外，與后七子關係密切的姜寶，屠隆，汪道昆，李春芳等人，都和陽明學者有着相當的聯繫。比如，據焦竑編《獻徵錄》載：

姜寶「同兄案力学，及遊荆川唐先生之門，所聞益進。荆川深期許之」（卷三十六《姜尚書寶小傳》）

李春芳曾「詣海陵王艮，東城林春講性學。已，復師事湛若水，歐陽公德」，他為相時，和徐階「同心輔政」。（卷十六，王錫爵《太師李文定公春芳傳》）

而據《明史·瞿九思傳》載，瞿乃羅洪先的學生，又曾從耿定向游。后因冤入獄，屠隆即「作《訟瞿生書》，遍告中外」（《明史》卷二百八十八）

這些，當然只是一些表面的例子，而從這些例子中，我們也不難看出，這些文人，學者，或是受陽明學的影響，或本身即是陽明學者，相互之間，織成了一個巨大的關係網絡。

至于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和陽明學的關係，中外的論者都已作過許多論述，要之，他們都曾師事過著名的陽明學者焦竑，李卓吾，尤其是袁宏道受李卓吾的影響較大，他的弟弟袁中道（小修）曾說：

先生（袁宏道）既見龍湖（李贊），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于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々

袁宏道自己對於陽明及其弟子則有如下的評價：

至近代王文成，羅叔江（羅汝芳）輩出，始能抉古聖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竽，擊文、武鐸，以号召一時之聳聳。

對王陽明等人的崇敬之心情，見于字里行間。

從三袁的交往友朋來看，陶望齡，管東溟，梅國禎等人，也都是陽明學的信奉者。

以上，我們就晚明時期各個主要文學派別的代表人物和陽明學的關係進行了一些粗略的探討，下面，我們再從這個時期在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個人與陽明學的關係，來進行一些研究。

首先看徐渭，徐文長。

徐文長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怪杰。他不僅詩文有名，也是一個出色的戲劇家，還是一個獨具風格的畫家和書法家。他受陽明學的影响是显然的。

徐文長是著明陽明學者季本的學生。他所撰《季先生祠堂碑》，對季本的學問，人品甚加讚許，在他所撰帶有自己簡單年譜性質的《畸譜》中，有如下記載：

廿七八岁，始師事季先生，稍覺有進。前此空過二十年，悔無及矣。<sup>20</sup>

在這篇《譜》中，他在「師類」，「紀知」部分，列有王畿，季本，唐順之之名，他受到陽明學的影響，可見而知。另外，前面我們已經提到的，胡宗憲到曾將他的文章作為唐順之之作，拿給

最欽佩唐順之的茅坤看，茅氏竟不能辨其真偽，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們在思想上的一致性。

### 其次看李卓吾。

關於李卓吾，論之者甚多。中國有不少學者認為李卓吾是反對程朱理學和陽明學的，對此，筆者不敢苟同，具體的情況，容作專門敘述，這里只從他的師承交遊關係的角度，來略事探討。

李卓吾對自己的師承關係，在《焚書·讀史稿·儲瓘》條中，說得很清楚：

（王襞），費之師。東崖之學，實出自庭訓，然心斋先生在日，親遺之事龍溪（王畿）于越東，與龍溪之友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邃也。東崖幼時，親見陽明。

這里，就把从王陽明到王心斋（王艮），王龍溪，再到王心斋之子王襞，再到李卓吾自己的師承關係說得十分清楚了。

他還對席書等人尊王陽明為師之事大加肯定：

當是時，人之尊信朱夫子，猶夫子也。而能識朱夫子之非夫子，唯陽明之學乃真夫子，則其見識為何如者！<sup>②</sup>至于李卓吾交遊中的焦竑，何心隱，耿定理及耿定向等，也都是和陽明學有相當關係者，此也是一般論述中已都論及的。

李開先。

這里僅舉兩條材料。據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載：

嘉靖初，王道思，唐應德倡論，尽洗一時剽擬之習。伯華（按：開先之子）與羅達夫（按：羅洪先），趙景仁（按：

趙時春）諸人，左提右挈，李，何文集（按：李夢陽，何景明），几乎遏而不行。又，據《獻征錄》卷七十載殷士儋所撰《李開先墓誌銘》中的記事，李開先在罷歸後，

稍益克拓舊學，與荆川唐公，念庵羅公約為天台，雁蕩之遊，值喪其內子，不果行。既而嘆曰：「會心處不必在遠，吾直巖居而川觀而！」

這里說的羅洪先，就是陽明弟子中以「歸寂說」著稱的代表人物之一。唐荆川我們在前面也已敘及，由此可見李開先和陽明學的關連。

### 湯顯祖。

湯氏以文聞名海內，一部《牡丹亭》，出生入死，情海情山，激蕩了多少人的肺腑。然考其師承交遊，也多陽明學者。他自称：

十三四時，從明德羅先生遊。血氣未定，讀非聖之書。所遊四方，輒交其氣義之士，蹈厲靡行，几失其性。

直到後來，「復見明德先生」，方才有所省悟。<sup>③</sup>因而。他對「明德先生」十分欽服，稱之為「先覺覺天下」之人。<sup>④</sup>而這里所說的「明德先生」，就是當時著名的陽明學者羅汝芳（近溪）。

湯顯祖的交遊中，李卓吾，三袁兄弟，徐文長，屠隆，陶望齡，梅國楨等人。都是和陽明學有密切關係者。他和東林黨中的陽明學者，也有相當的聯繫，與顧憲成，高攀龍俱有書信往來，<sup>⑤</sup>而鄧元標則尤其賞識顯祖，以致湯顯祖被罷職閒居時，他發出了：

茫々海宇，遂不能容一若士（湯顯祖字若士）之嘆<sup>②</sup>，可見他們交往和相知之情。在這樣的環境中，湯顯祖和陽明學者的關係也可想見了。

歸有光。

據《明史·文苑傳》中歸氏的傳記云：

隆慶四年（1570），大學士高拱，趙貞吉雅知有光，引

為南京太僕，留掌內閣制敕房，修《世宗實錄》，卒官。

錢謙益《歷朝詩集小傳》的記載略同。然而，如果我們稍微考察一下明朝當時的政治狀況，就可以知道，高拱和趙貞吉二人是很不相和的，《明史·高拱傳》載：

時大學士趙貞吉掌都察院，持議稍異同。給事中韓揖劾貞吉有所私庇。貞吉疑拱嗾之，遂抗章劾拱，拱亦疏辨。帝不直貞吉，令致仕去。拱既逐貞吉，專橫益著。<sup>③</sup>

黃宗羲《明儒學案》也記載，趙貞吉和高拱「議多不和」<sup>④</sup>，《獻征錄》所載《趙貞吉傳》同<sup>⑤</sup>。也就是說，這兩個宰輔，在政見上乃是對頭。

歸有光却和這兩人都保持了良好的關係。那麼，歸有光在這兩人之間，是「首鼠兩端」，还是有所偏重呢？身為一區々小官的歸震川，當然不可能直接地介入作為內閣重臣的高趙二人之爭，但是，如果我們從《震川先生集》中所載的分別致兩個人的信來分析，他的感情傾向还是十分顯然的。他在致高拱的信中，官場的客套話為多，但在致趙貞吉的信中有曰：

昨春自越還，遇瞿文懿公（按：瞿景淳）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為薦，有惑於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

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公知子深矣，力足以薦士矣，尚格而不行！」語畢，黯然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遊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之前，其不能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sup>⑥</sup>

他和趙貞吉相識的時間之久，對趙氏的感激之情，充溢於字里行間。

趙貞吉者，泰州學派中著名人物。「李贄謂其得之徐波石（按：徐穉）」，而徐波石曾師事王陽明，又卒業於王心齋之門<sup>⑦</sup>，則趙貞吉為王陽明的再傳或三傳弟子。再聯系到趙氏和高拱曾經為徐階之事發生爭論<sup>⑧</sup>，而歸有光在文集中留有致徐階的書札，對徐階表示知遇之恩，歸氏還對師事歐陽德，效約等陽明學者的戴楚望頗加贊許<sup>⑨</sup>。由以上種々事例來看，他和陽明學者之間的交往關係，也就可以明白了解。

最後，我們再稍涉及一下錢謙益。

錢謙益和陽明學者的關係，吉川幸次郎先生在二十多年前發表的論文《錢謙益和清朝經學》中，已經有所論述。錢謙益所處的明末時期，陽明學已經歷了它最發皇的階段，因而，錢氏對陽明學末流中的「俗學」，有所貶斥。但是，他曾交識袁小修，對於李卓吾甚為傾服，對陽明的學問，頗為尊敬。他還是陽明學者管志道的學生。在《管志道行狀》中說：

謙益少游于梁溪，顧獨喜讀公之書，私淑者數年。丁未之秋，執弟子札，侍公于吳郡之竹堂寺……<sup>⑩</sup>

筆者在拙文《錢謙益：明末士大夫的典型心態》中，對此也略加

涉及，如能參閱，不勝榮幸。<sup>④</sup>

此外，活躍在明末文坛上的焦竑，梅鼎祚，黃驥德，祁彪佳

等人，我們也都可以從他們的師承交遊中，找出和陽明學，陽明

學者的關係，鑒於篇幅，不詳述了。

總之，在晚明時期，從正德，嘉靖年間，陽明學流布國內，到隆慶初年，王陽明受謚「文成公」，被正式捧上祭祀的靈廟，以後，歷經万曆時代而大盛。陽明學在當時的中國，不僅只是  
一種思想，而且還表現為一個學派，一種現實的文化運動。那個時代的文人，學者，詩人，作家，是密切地交融在一起的，并沒有如我們今日所視的那種特別的界限。正如我們很難严格地區分，李卓吾，唐荊川到底是思想家，文學者或作家一樣。他們生活在陽明學被作為正統思想流傳的時代，他們或是和王陽明本人有着某种交往，或是和王陽明的弟子，門人，私淑後學互為朋友，師生。許多今日被称之为「詩人」，「作家」的文人，本身就是陽明學者，離開了他們，就無所謂晚明文學，也不会有今日所謂的「陽明學」。因而，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的描述，筆者認為是不符合當時歷史事實的。

當然，晚明時代的文人中，由於經歷，際遇，師承等々的不同，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流派，對傳統的儒學或文學藝術上的各種問題，有不同的見解，這都是客觀存在，可以進一步分析。但是，當時恐怕并不存在什么只和所謂的「王學左派」有關，或只受到「王學左派」的影響而反對陽明學的情況。當時的文人，大多被織入了與陽明學有關的社會網絡中，這種歷史的現實，是无法用想像的理論模式來改變的。而這種現實的社會聯系，對於我

們研討晚明文學和哲學的關係，研討文學和陽明學的關係，都是必須應當重視的。

### (三)

(關於晚明文學代表作家和陽明學思想上的聯系以及對陽明學的贊許，評論。略)

#### ①

本文系據筆者在一九八九年第三十四屆國際東方學會上發表的報告提綱整理而成論文的一部分。全文共分三部分，這是第二部分。文中的「陽明學」，指的是中國的陽明學，或稱心學。

在發表時，承蒙山井湧教授，清水茂教授及司会福井文雅教授諸先生的指點和闡照，在此謹表謝意。

又，尤其令筆者記在心間的是，山井湧教授於去年四月病逝，現已周年。筆者曾蒙山井先生闡照，感銘殊深。不揣淺陋，以此聊表心意，祈祝先生冥福長久。

一九五七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版《列朝詩集小傳》，下引此書概同。《四部備要》本《陽明全書》附錄。下引此書版本同。

④ ③ ② 見《明史》各人本傳。又參見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

⑤ 見《陽明全書》卷十九《歸越詩三十五首》及《山東詩六首》下注文。

⑥ 見《陽明全書》卷二十五所載，又見焦竑《獻徵錄》卷七十三所載（上海書店，一九八六年影印本，下引此書版本同）。

⑦ 參見《陽明全書》附錄《王陽明年譜》。

⑧ ⑨ 見《明通鑑》卷四十三「正德五年」八月辛丑條下。（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標點本，下引此書版本同。）

⑩ 同上書，見卷四十四「正德六年」正月丁丑條下。

參見游國恩等編《中國文學史》第七編概說。明代文學的分期是一個可以再

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這里姑采其說。

此書見《荆川集》卷四。《四部備要》本

見《獻徵錄》卷六十三。

見《明儒學案》卷二十六。（中華書局標點本。北京版）

見《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五。

見王世貞《讀書後》卷四《書王文成公集后》（《四庫全書》所收《弇州山人

四部稿》本）

見《獻徵錄》卷十六。

見《陽明全書》前所收序文。

見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狀》。此轉引自錢伯城校箋《袁宏道集》卷一《別龍

湖師》後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同上書所收《瀟碧堂集》之十七《為寒灰書冊寄鄖陽陳玄朗》

見《徐渭集補編》所收。（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見《續藏書》卷十二《席書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標點本。）

見《湯顯祖詩文集》卷三十七《秀才說》。（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同上書，卷三十二《明德先生詩集序》。

見上書所收各種書札，又可參見毛放同編《湯顯祖研究資料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見《湯顯祖詩文集》卷四十六《答馬心易》。

見《明史》卷二百十三。

見《明史》卷二百十三。

見該書卷二十三「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條下。

見該書卷十七。曰：「上以公贊理機務加太子太保。是時閣臣高拱兼掌吏

部事。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為分謗地，故推公兼掌都察院事。」而

二人爭執情況，傳中也有記載。

見《震川文集》卷六所收《上趙閣老書》。歸氏致高拱書以及下面談到的致

徐階書等也見此書收錄。相互對照，歸氏的語氣，態度顯然。

見《明儒學案》卷三十二及三十三所載趙貞吉，徐懋事。

見《獻徵錄》卷十七所載《少保趙文肅公貞吉傳》以及《明史》高拱，徐貞

吉傳等。

見《震川文集》卷六《上徐閣老書》及卷二《戴楚望集序》。

見《初學集》卷四十九《朝列大夫管公行狀》。（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

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九年第—期